

同  
月

岁月

1964—1976年的清华

刘冰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 岁月

1964—1976年的清华

刘冰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刘冰著.—北京：当代  
中国出版社，2008.3

ISBN 978-7-80170-685-0

I. 风… II. 刘… III. 清华大学—校史—1964~1976  
IV. K2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5612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策 划 王 睿  
特约编辑 王 皓 张 瑞  
责任编辑 任小平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mailto: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  
市场部 (010)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  
开 本 68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印张 4 插页 插图 37 幅 204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010)66572159





作者近照

2015



■ 1951年11月20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纪念。前排左起：章泽、许立群、荣高棠、宋一平、李昌、蒋南翔、廖承志、朱德、毛泽东、冯文斌、陈锡联、王中槐、罗毅、高扬文、刘导生、许世平、欧棠亮、杨述；第二排左三为刘冰。



■ 同清华大学电机系 61 届毕业设计科技先进小组合影。前排左起：李寿慈、艾知生、刘冰、蒋南翔、胡健、陈士骅；第二排左四为高沂。



■ 1997 年 4 月 12 日，清华大学六位老领导在甲所门前合影。左起：胡健、陈舜瑶、刘冰、高沂、何东昌、艾知生。





■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期间，清华大学毕业生到代表驻地看望刘冰。



■ 1978年，刘冰（前排左一）与惠宪钧（后排右一）、柳一安（前排右一）、吕方正（后排左一）的合影。

## 再版序言

《风雨岁月》于1998年2月内部出版发行，当年4月第二次印刷。现在应读者的要求再版，并且公开发行。

这本书记录了我在“十年浩劫”中的亲身经历。记录这段历史是想让人们了解那场动乱中的一些真实情况，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党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并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的从党内波及到党外的一场全国规模的大的政治斗争。在这场非常特殊的斗争中，作为共产党员既要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又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组织原则，实属不易。

我在“文革”中，无论是上书毛主席、党中央，还是在校内与师生员工一起同“四人帮”的代理人作斗争，在凄风苦雨中挣扎搏击，支撑我思想和精神的，固然源于自己的理想信念，相信党、相信群众。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在与蒋南翔同志长期共事中，他的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精神，一直是鼓舞着我同错误和邪恶势力战斗的力量。我想借再版的机会讲述一些蒋南翔同志这方面的事，作为对这本书的补充。

蒋南翔同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善于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清华大学的实际，贯彻落实党中央、毛主席的教育理论、教育方针，给党和国家培养输送了成千上万“又红又专”的高质量人才，创造



了“蒋南翔教育思想”。这在清华大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高峰。我作为他的助手，在工作中跟他学习办高校、搞教育，也学习了政治。当时在学生中流传“刘冰报告、南翔精神”，确是如此。

60年代初，南翔同志多次提醒我注意“左”的影响，防止思想政治工作中简单化的倾向。在他的启示下，我和学校团委的同志研究，制定了一个团支部的工作条例，以便学生中党团组织的工作有所遵循。团委的同志走群众路线，集中了五十条思想、政治上的政策界限，在团员和同学中普遍征求意见后，又经党委讨论通过。这就是《清华大学学生团支部工作条例》，简称“五十条”。实行之后，反应热烈，效果良好。

《条例》被《红旗》杂志选登在《内参》上。1961年春天，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例会，我随南翔同志参加了会议。康生在会上手指蒋南翔，高声斥责：“你那个清华大学，自己搞了个团支部工作条例，昨天我全天都在看你那个条例。好家伙，你一个学校可以制定团的工作条例，真了不起！能这样做吗？”对康生这个以势压人的话，南翔同志未予理睬。会议室里沉默了几分钟，不了了之。会后，南翔同志对我说：“我们党历来有个规矩，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各级党委可以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条例、规定。我们这个‘条例’正是为了切实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从学校的实际和工作需要出发制定的。条例的执行情况是好的，是合法的。学校仍应按照原定计划实行。”并且要我以党委名义写出报告，送康生，同时报送中央文办、中宣部、高教部、北京市委，说明制定“条例”的理由和实行的情况。南翔同志说：“对于领导人的话，我们要尊重，但我们头脑要清醒。”按照南翔同志的意见，校党委作了妥善处理，得到了学校广大党团员的支持和欢迎。

1965年，在一次全国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上，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批评清华大学办得太大了，要一分为四。这个批评因为涉及到清

华的命运，使我心情沉重。1964年中央决定清华在四川办分校，学校正在贯彻落实之中，基本建设已大规模展开。中央领导应该都是知道的。现在提出一分为四是什么含义？清华该怎么办？散会后，我立刻问南翔同志知道不知道此事？他说：“不知道，你先回学校，待我了解情况后再告诉你。”晚上南翔同志来电话，说他问了彭真同志，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也未听有谁提出过这个问题。南翔同志说：“你告诉党委的同志，清华办多大，怎么办，要根据党中央的正式指示和决定执行。对领导同志的话，我们要尊重，但那只是个人的意见，我们不能执行。”南翔同志这种为了党的事业坚持原则，充满党性的言语，至今我记忆犹新。

蒋南翔同志一直比较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这一点，无论是在团中央还是在清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秋，在他的提议下，我从团中央调到清华工作，往后的岁月里我经常当面受到他的教诲。1957年有几次我到他的寓所，都遇到他在圈圈点点阅读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征求意见稿。他问我对主席的著作学得怎么样？我说：“学习了，但很粗糙，不深入。”他说：“主席的著作很精辟，要仔细认真学习。有些重要的地方，要多读几遍。”在他的启示下，我通读了“毛选”四卷，并把《矛盾论》、《实践论》反复学习了多遍，使我终生受益。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大搞个人崇拜，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背警句、搞“立竿见影”。南翔同志不赞成这种搞法。他在学校多次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学习精神实质，不能简单化。有一次，因一篇文章要发表，我请他帮我看看。我说，我写东西不愿搞引证。他说，搞引证干什么，现在是一股风，重要的是学习精神实质。现在有人提出“顶峰”，就不发展了嘛！？

“文革”前夕，林彪搞的“个人崇拜”声势已快到“顶峰”了。

此时，蒋南翔同志在全校大会上讲话，批了“顶峰论”。他说：“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是不发展了嘛！这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辩证法是发展的嘛！‘高峰’比较确切。”这真是语出惊人！他在政治上的勇敢，理论上的真知灼见令人敬佩！这使我联想到“一二·九”运动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学生时代的蒋南翔奋起救亡，写出《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千古绝唱，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现在，还是这个蒋南翔，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很多人头脑发热的时候，他站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公开批了“顶峰论”。他勇敢无畏，坚持马克思主义、捍卫真理的胆识和精神，仿佛再现了“一二·九”运动中那个英姿勃发的青年蒋南翔。所不同的是，这时的蒋南翔已年过半百，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千锤百炼，更加成熟了。

蒋南翔同志从1966年6月8日第一次被批斗开始的往后几年中，不管是在批斗时，还是在北京卫戍区关押“监护”期间，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是犯了“路线错误”。他坚持十七年新中国高等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基本的。

1970年工农兵学员进校几个月后，迟群、谢静宜炮制了一篇《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的文章，他们简称为《创办》，并称是毛主席批示肯定的。文章完全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工作的巨大成就，一概称之为“封、资、修教育”；把教师统统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诬蔑“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蠢”。文章一出笼，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立刻召开座谈会，炮制《座谈会纪要》，南北呼应，并在《红旗》杂志1970年第8期上同时刊登。全国各大报刊也随之转载。此时迟群、谢静宜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蒋南翔从北京卫戍区要到清华“监督劳动”。蒋南翔同志回校后，迟、谢们大言不惭地问蒋南翔对“学习《创办》有什么看法？”南翔

同志当即把他 在卫戍区“监护”时，对《创办》逐条批注的那本第 8 期《红旗》杂志交给了他们，并严肃地说：“这就是我的看法！”迟、谢们没有料到身陷囹圄、处境困难的蒋南翔，竟然敢于对自称“主席的两个兵”、位居国务院科教组领导的“大人物”这样藐视，立即下令对蒋南翔加紧连续批斗。

在与迟群面对面时，蒋南翔说：“对过去和现在的工作都应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评价，不能以偏概全、举几个例子就概括全体。你们对过去十几年的教育工作举了些例子，说我是黑线。我也可以举出另外一些毛主席、周总理肯定的例子，如 1958 年密云水库的设计、二百号原子反应堆的建成等等，这些红点连起来就是一条红线。你们这些批判说服不了人，不能搞实用主义。”迟群怒不可遏，指着蒋南翔说：“你为自己辩护，没有悔改之意。”蒋南翔同志回答说：“你们在全国报刊上点名批判我，对群众的批评，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你们是领导，对我的批判要负责任！我不为自己辩护，谁来为我辩护？”

蒋南翔同志对好心规劝他的几位教师说：“在伟大的革命事业面前，我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个人的安危是微不足道的。可教育事业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正确的我就要坚持。”南翔同志的话掷地有声，震动了整个清华园，也深深地震动着我。1966 年 6

1978年6月30日 星期五 第二版
清华大学

从六九年到七〇年，迟群在许多场合，向校内外大肆介绍所谓“清华教育革命的经验”，全盘否定文化革命前清华从招生到毕业分配等所有的教育制度，在他的稿子基础上炮制成的《创办》，把十七年的高等教育概称为“封、资、修教育”。一开始就强调：“……批判封、资、修的教育制度和每个学术领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红旗》第8期第6页）

批注：什么是封、资、修的教育制度？主要内容：a. 招生制度  
b. 毕业生分配制度  
c. 任用教师制度及学位制度  
d. 工资制度  
e. 升留级及毕业制  
(这就是封、资、修的教育制度?)

## 蒋南翔同志对《创办》的批注

《创办》提出，理工科大学招生的文化程度相当于初、高中水平，老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理工科大学除去在校内外办学制为二至三年的普通班和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外，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办校内外科学研究所，业余大学以及专题短期培训班……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

批注：在高等教育中取消双轨制学校存在。

“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理工科教材旧体系的要害，它浸透在教材的字里行间……”。“这样的旧教材……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第 15、16 页）

批注：以偏概全，举一例以概全体。过去也有总结实践经验的教材。  
旧的理工科教材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生了

批注：“工农兵要懂无产阶级教育”与“最需要什么阶级教育”区别，“可能性与目前现实性”区别，“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区别。

对于学校原有的教师队伍，《创办》毫不分地统统说成是“长期‘三脱离’”。（第 9 页）

批注：有些是长期三脱离，有些不是！，不能一概而论。

《创办》假借工农兵的反映，把过去学校广大教师说成是与工农兵“心隔心，谈不拢”。（第 10 页）

■ 1978 年 6 月 30 日《清华大学学报》登载的蒋南翔对《创办》的批注





■ 1981年春天，刘冰（前排右二）陪蒋南翔（前排右三）视察敦煌莫高窟。

月9日清晨，南翔同志在电话上告诫我的话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此时又响起在我的耳边。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蒋南翔同志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始终激励着我去斗争，直至和“四人帮”的代理人迟群、谢静宜作最后的斗争——上书毛主席。

蒋南翔同志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清华大学永远的骄傲，他的名字和业绩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将永远熠熠生辉。

以上就是我在《风雨岁月》再版时要说的话。一方面以此来缅怀我的良师益友南翔同志，另一方面也把蒋南翔同志的崇高人品介绍给广大读者。

刘冰

2007年12月12日

## 前 言

“文化大革命”那场历时十年的灾难和悲剧是从文教阵地首先发动的，清华大学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十年中，清华园里的各种风波起伏都与全国政治斗争的大局紧密关联，并且始终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密切注视，乃至直接干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是“红卫兵”的诞生地，是毛主席亲自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全国。1968年7月27日，是毛主席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标志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1973年的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以清华大学为风头，进而波及全国。“文革”后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是从毛主席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四人告发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开始的，清华大学遂成为这场斗争的突破口和前哨阵地。因此，十年风云变幻的清华大学，在一定意义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窗口或缩影。

我亲自经历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并因所处的地位而被深深卷入了激流漩涡。“文革”开始前，我是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因为校长、党委书记职务由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同志兼任，我对学校的日常事务管得多些，运动中自然成为重点冲击对象。历经三年磨难，1969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解放”“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刘某人的消息，使我这个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在全国范围“榜上”有名。之后，我被“结合”为校党委副书记，“文革”后期担任了常务副书记，终于“官复原

职”。那时的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是官居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的风云人物迟群，排位在我之后的另一位副书记则是风云人物、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夹板中的我在那个多事之秋常常被推到前台，却又事事受制于人，实谓步履维艰！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做法，对“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倒行逆施，进行过多次的抗争。十年中我和几位一起共事的同志曾向毛主席、党中央三次写过四封信，而每一次都使自己增加了新的罪名，受到更加严重的冲击。第一封信是“文革”初期，我自己写给毛主席的；第二封信是我同原清华党委的几位副书记联名写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这两封信陈述了清华大学“文革”前十七年是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绩是主要的，并如实反映了当时学校和社会上严重混乱的局面。后一封信被转到了蒯大富的手中，我们联名写信的行为被打成“清华园的‘二月逆流’”。第三、第四封信是1975年的下半年我和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三位负责人一起写给毛主席的，信中揭露了迟群及谢静宜的政治野心和种种丑恶言行。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作了批示，认为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主席的这个批示震惊了全国，成为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令。刘冰等四人由此成了胆敢把矛头对着毛主席的“还在走的走资派”或“投降派”，又被批斗、专政达一年之久。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两年多之后，在邓小平同志过问下，随着两个“凡是”被冲破，冤案才得以平反。

在如此激烈、复杂、曲折的斗争中，我也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写过过头的检讨。这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有多种原因，而从根本上说来，我是在非常矛盾的处境和心态中被卷入这场运动的。一方面，我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革命对象——“走资派”，首当其冲地被打倒了；另一方面，我又作为“革命干部”被较早地解放了出来，去充当“革命的动力”。我就是以“走资派”和“革命干部”、

“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这样的双重身份，在风浪中起落沉浮，打倒、解放，第二次被打倒……

一方面，这场运动是由自己所一贯敬仰和信赖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对于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战胜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在大风大浪中选拔和锻炼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指示，我是完全相信和衷心拥护的；但是另一方面，毛主席认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基层党组织相当多数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文教阵地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得到贯彻，并基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这种错误估量，采取打乱和抛开党的组织系统，直接发动群众进行冲击的做法，酿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愿望与效果严重背离的大动乱，对此，我又是难以理解、无法接受并痛心疾首的。然而当时我自己以及许多党的干部，对于如何实现毛主席关于反修防变的战略思想，如何进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以巩固党的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弄得很清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还缺乏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头脑中存在着“左”的影响。因而在混乱和困惑中所作出的选择是：相信毛主席的智慧和远见，维护毛主席的权威，努力从积极方面去理解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如果不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绝对信赖和真心拥护，又怎么会对给党和国家带来如此严重混乱、颠倒和破坏的“文化大革命”表示拥护呢？这就是我当时似明白又混乱的矛盾心态。在那样严重扭曲了的政治环境中，诚实善良的人们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有时也会行为与目的相脱节，甚至发生“煮豆燃萁”的不幸情况。“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愿本着“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精神，汲取历史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

“文化大革命”结束已近二十年，今日我已无须再为二十年前的自己辩诬和诉苦了。但是我想，如果站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立场上，抱着对历史及未来负责的态度，诚实地记录下一份史料，并努力用历史唯物的眼光，从纷乱、颠倒的现象中寻出某些必然性的联



系，引出一二经验教训，则是有意义的。因此，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试着写了这本《风雨岁月》。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多老同志、老战友以及一些年轻同志的细心指点和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如果这本书能对读者有些益处，能对困难时期帮助过我、关心过我的命运的人们表达出一些感激之情，我将十分欣慰。书中疏漏与不当之处，尚期各方面同志指正。

刘 冰

1996年2月1日于北京